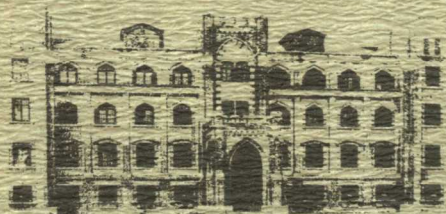


章开沅 主编
教会大学在中国
王国平 编著

东吴大学

博习
天
賜
庄



教会大学在中国
章开沅 主编

博习天赐庄

东吴大学

王国平 编著

38.85
128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博习天赐庄——东吴大学/王国平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12

(教会大学在中国)

ISBN 7-5434-5317-7

I. 博… II. 王… III. 东吴大学-校史

IV. G649.28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9151 号

主 编: 章开沅

著 者: 王国平

博习天赐庄——东吴大学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策 划 / 路殿维 张艳如

统 筹 / 何建民

责任编辑 / 孟保青 袁鸿蕙

装帧设计 / 郑子杰 郭丽娜 王海鲸

印 刷 /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10.125

出版日期 /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434-5317-7/G · 3458

定 价 / 25 元

总 序

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滋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绝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我们深信，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进展，必将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讨产生促进作用。

迄至1949年为止，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至十五，但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既包括积极的影响也包括消极的

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又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

中国教会大学尽管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与较大贡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本土化进程的加速，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逐渐减弱，教育功能日益增长，而且不断加强与社会联系并为社会服务。它不仅通过自己培养出的专业人才，而且还通过在校师生的专业实践，直接在若干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如金陵大学的农业改良与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与社会学系，华中大学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专业，东吴大学的比较法学，圣约翰的商科等等，在社会上都有出色的表现。

中国教会大学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大环境中形成若干个较为开放的小环境。与国立大学相比较，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直接的接触，思想比较活跃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同时，也由于更为经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国势



力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比较容易触发民族反抗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都有大批教会大学师生积极参加，有的教会大学甚至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大学史对于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史、革命史也有一定意义。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还得取决于它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将其带回西方故土。所以，对于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我想，探讨中西文化的双向流动，可能会成为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很有趣的课题。

无庸讳言，一些教会与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为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教会大学曾引起众多中国人士的反感，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以后，它长期被人们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堡垒。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尖锐的批评虽然不无依据，但却失之笼统与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

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也没有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这种偏颇的评价，对于那些勤恳的毕生奉献教育事业的中外教职员，很难说是公正的评判。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突然消失了。正如曾在金陵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博士(William Fenn)所言：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划下句号时，中国教会大学可以充满骄傲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但是却未必有对于未来的希望。

建筑和设备仍然留存，教师可能在新的学校任职，但教会大学从此消逝。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中国教会大学这个名字，将被视为大西洋两岸基督徒对太平洋东岸伟大人民的辉煌贡献而永远铭记！

今年10月是我曾为之工作半个世纪以上的华中师范大学的百年校庆，也是其前身文华书院创建一百三十二周年，谨以这套图片集献给所有曾在中国大学校园内勤劳耕耘过的中外先驱者！

章开沅

2003年春于桂子山麓





目 录

东吴大学的筹备与建立	3
东吴大学的早期发展	31
时局转变与东吴大学的继续发展	85
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吴大学	109
抗日战争后复校	123
在新中国	137
大事年表	149
后 记	159

A0784/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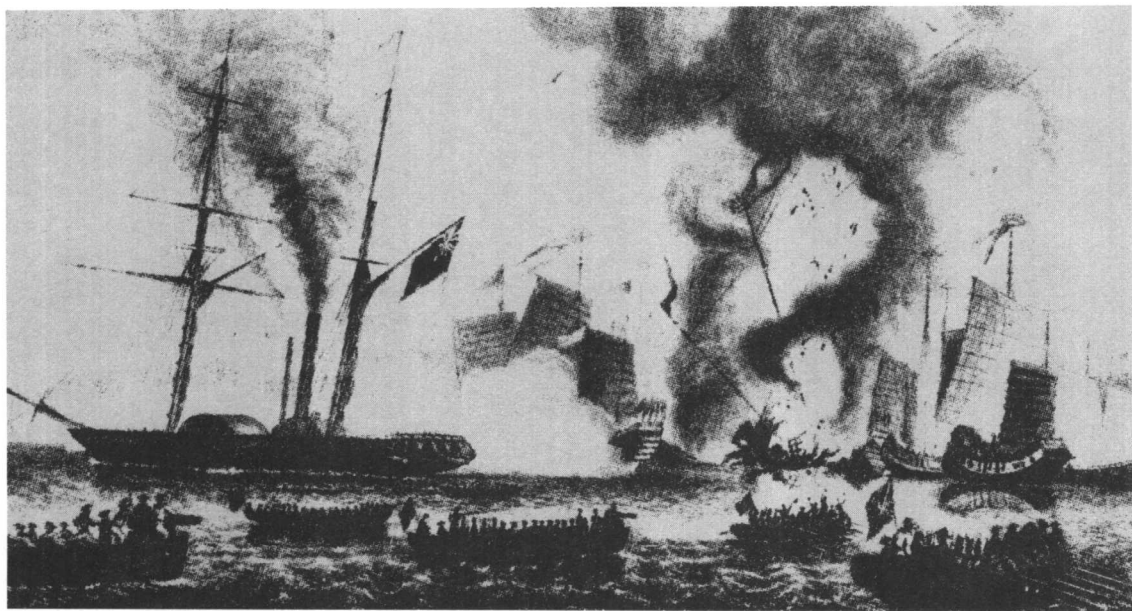


东吴大学的筹备与建立（1871—1901）

一、晚清中国社会对近代教育的呼唤

1. 晚清民族危机

中国有足以骄人的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汉唐雄风曾引世界为之折腰。从古代地缘政治来看，中国无疑是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中心。中国是“中央王国”，四裔则为藩属和“蛮夷之邦”。封闭在山海之间和传统思想之中的中华帝国，没有兴趣去了解在她视野之外的这个世界，那个先是缓慢、然后又加速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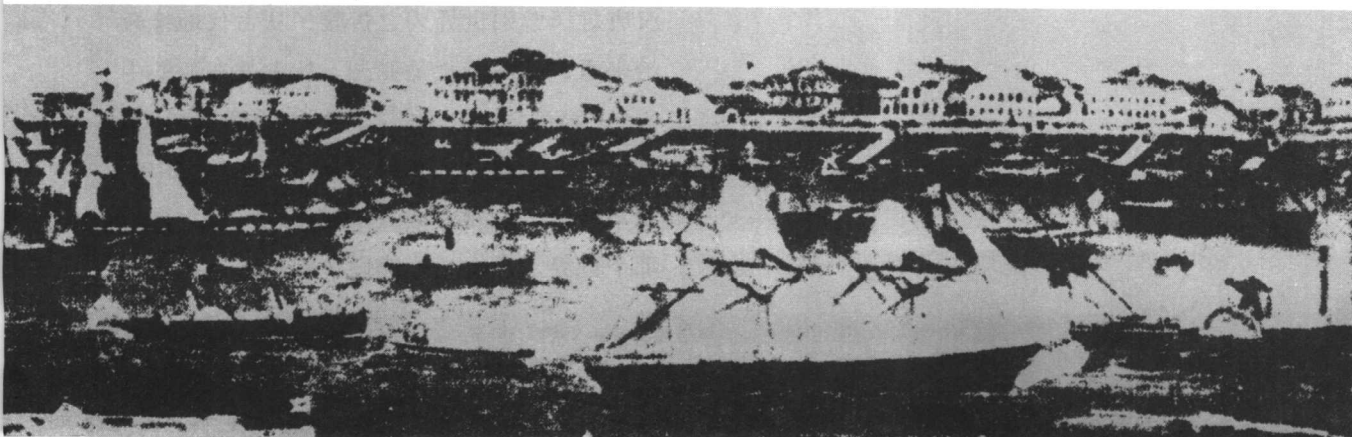
穿鼻海战

变化的世界。到十八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中国却仍然停留在“牛郎织女”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统治中国的清政府则酣睡于“乾嘉盛世”的美梦之中。进入十九世纪后，世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中国却已远远落伍了。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西方强国的第一次综合国力的较量，中国失败了，被迫

与英国订立城下之盟，赔款、割让香港、开放上海等五口通商。《南京条约》以及随后与法国、美国等列强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从此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中国开始套上半殖民地的枷锁。神州陆沉，有识之士冲决传统思想的罗网，把学习西方、强国御敌的命题提上了近代中国的议事日程。著名思想家魏源大声疾呼：“师夷长技以制

开埠之初的上海（1850年）



夷”。然而，清朝统治者似乎并没有被震醒，在他们看来，《南京条约》就是“万年和约”，天下从此太平了。军队依旧积弱不振，吏治照样腐败，整个官僚机器所赖以建立的科举制度和教育体系没有丝毫改变。

接着便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再一次的丧权辱国。除赔款以外，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全国各地传教，外国公使进驻北京也成为现实，而这些都是清政府最不能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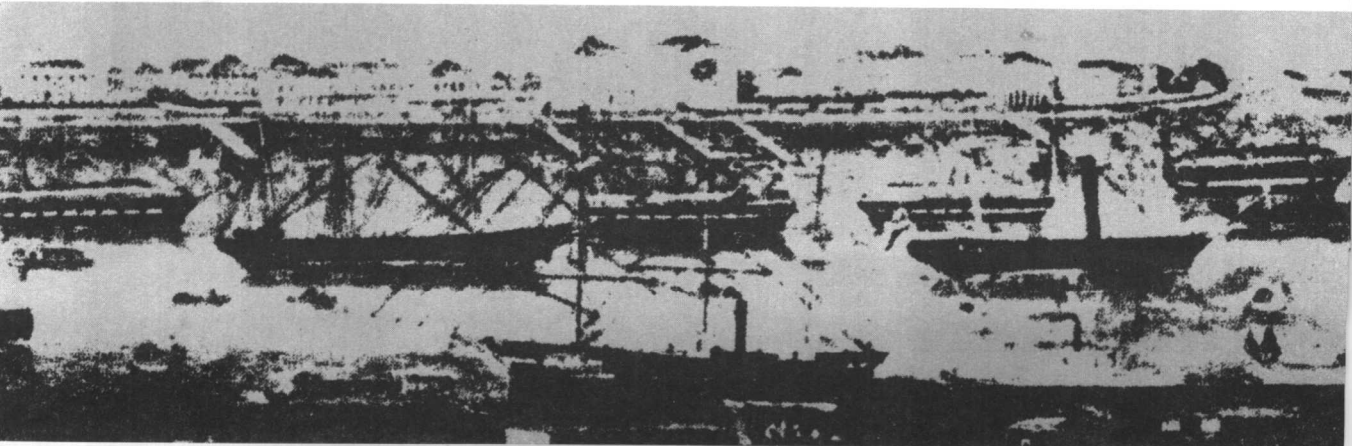
这一次，清政府被大大地触动了。清政府重臣李鸿章对时局作了这样的描述：“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作为封建统治者，清政府首先想到的是效仿西方的“坚船利炮”，于是有了洋务运动。这一“求强”的运动发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这块古老土地的地平线

上出现了一线现代工业文明的曙光，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诞生了，军事工业又拉动了民用工业，翻译人才、近代工业技术人才，成为实实在在的社会需求。社会对人才的渴求开始呼唤近代教育的产生。但是，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年，就教育而言，中国仍然维持着以科举制度为核心的教育和官吏考选体系。

2. 传统教育体系的弊端

科举制度自隋唐产生至晚清咸同年间，已经存在一千二百余年了。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它的弊端也与生俱来。中国传统教育唯科举考试的马首是瞻，教学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及各朝律法等。自明代出现“八股”考试后，直到晚清，学校着重教学生仿作空疏僵化的八股文，以应付科举考试。当中华民族直面亡国灭种危机之时，科举制度遭到志士仁人的猛烈抨击。维新人物康有为说：“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而民

^① 《李文忠公奏稿》卷二十四，第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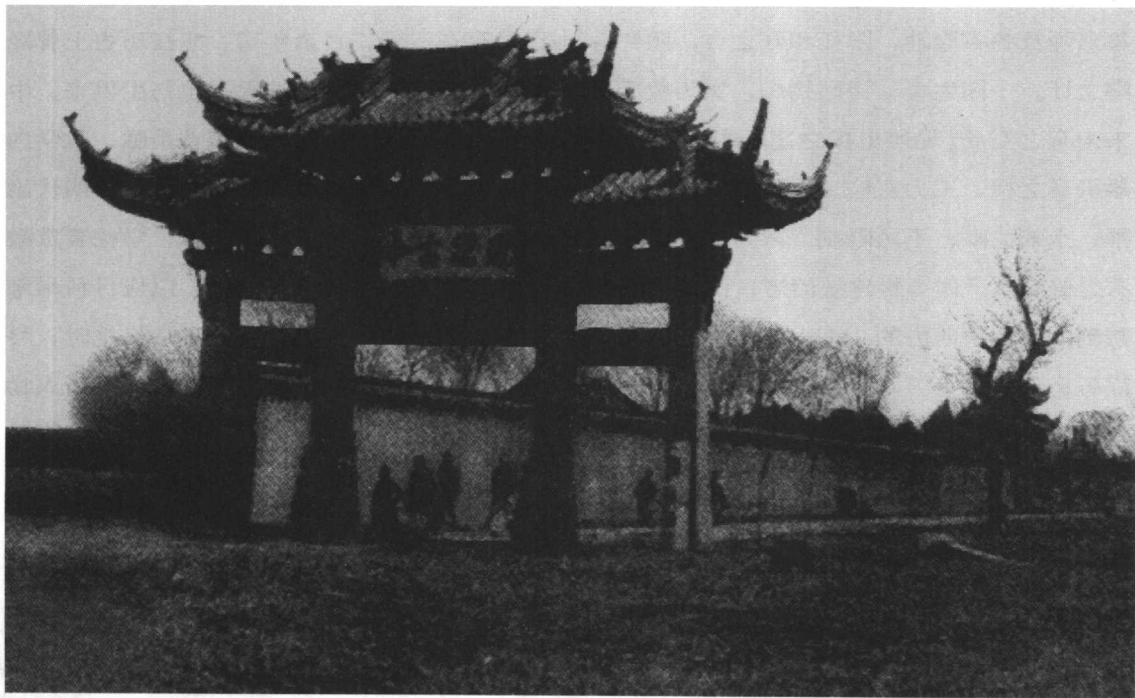
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故辽、台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光緒皇帝也曾感慨地说：“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②

3. 从同文馆开始的中国近代教育

1862年1月，清政府设立对外交涉的中

央机构总理衙门。同年8月，总理衙门附设同文馆。这是第一所中国官方创办的外语学校，最初设英文、法文、俄文三馆，招收十四五岁左右的八旗子弟入馆，培养翻译人员和外交官员。在同文馆任教的传教士有傅兰雅、丁韪良等。丁韪良后来被聘为同文馆总教习。

从六十年代起，清政府中央和地方所办外语（兼习西学）学堂还有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除了创办新式学堂外，由于洋务运动的需要，清政府还多次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因招生规模和政府政



苏州文庙

^②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策的局限,这些新式学生远远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与需求。

近代教育发生伊始,就遭到守旧势力的极力抵制。1866年12月至1867年1月,恭亲王奕訢等两次奏请招收举人、贡生及科举正途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以及翰林与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入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此举竟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守旧分子如大学士倭仁等认为,科举正途人员“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不能“习为技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若以“夷人为师”,“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③结果,“因浮言四起,正途投考者廖廖。”^④

应该指出,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前,这些新式西学学堂的教育以及留学生教育与旧的教育和选官制度存在根本的矛盾,想从科举讨前程的读书人不会轻易放弃科举考试而进新式学堂或出洋留学。但同时也不能排除,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刺激,会触发重大的社会变动,造成对旧的教育体系的突破。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和中国战败于“蕞尔岛国”日本的耻辱,以及此后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推动维新思潮澎湃向前。1898年“百日新政”期间,按照维新派的建议,光绪皇帝下诏废除

八股,“改试策论”,作为向废除科举的过渡。

中国近代教育就这样开始在新旧思想的冲突中蹒跚前行。

基督教在中国所举办的教育事业,在上述历史背景中发轫、发展,给近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增添了一份特殊的遗产。

丁韪良及其中国学生



③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六,第3页,第24页,第44页。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④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九,第30页。民国十九年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二、监理会及其创办的书院

1. 监理会来华传教

1819年,美国卫斯理宗教会“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成立,本部设在纽约。1844年,该教会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北方随即成立美以美会(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1846年,南方成立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或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South),本部设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⑤在对外传教活动中,监理会是美国基督教新教的重要差会之一。

监理会成立伊始,就特别注重举办教育事业与医疗卫生事业以推动教会事业发展,并对到中国传教有特别的兴趣。对监理会来说,这个时候到中国传教,正赶上百年不遇的良机——清政府刚刚开始松动对基督教在中国传教的禁令。

从康熙末年到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严

令禁止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一切活动。^⑥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逐步松弛和废止一些禁教规定。外国传教士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五个通商口岸,在那里居住并建立礼拜堂,再也不用担心被拘捕和驱逐了。

1847年,监理会决定委派南卡罗来纳州的戴乐(Taylor, Charles)到中国传教。不久,又委派秦右(Jenkins, Benjamin)与戴乐同行。1848年4月24日,戴乐夫妇与秦右夫妇一行四人乘坐开往上海的Cleone号轮船,从波士顿出发,^⑦历经近五个月的海上漂泊,戴乐夫妇于9月20日抵沪。秦右夫妇因病中途滞留香港,次年5月到上海。^⑧此后至1860年,又有蓝柏(Lambuth, J. W.)夫妇、林乐知(Allen, Young John)等传教士陆续抵沪传教。

1858年《天津条约》订立之前,传教士还没有获得离开通商口岸到内地活动的条约权利。监理会传教上来华初期,上海便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地区,不久,他们又将传教活动扩展到苏州及苏州的周边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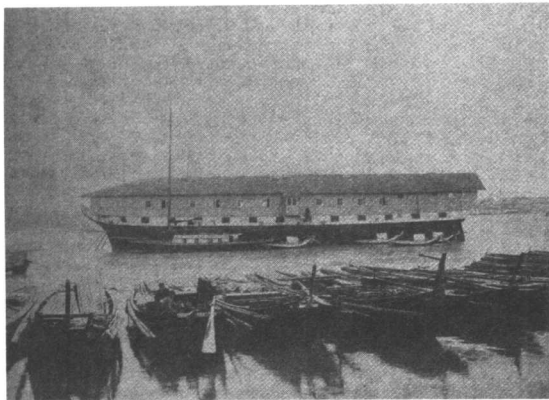
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与列强订立

⑤ 美国卫斯理宗到中国传教的教会除美以美会、监理会以外,还有美普会。美普会(Methodist Protestant Mission),母会原称“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1880年前成立,本部在堪萨斯州堪萨斯城。1939年,美国美以美会、监理会及美普会合并为一个教会。1941年,原三会在华差会亦合并为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简称卫理公会(Methodist Church Mission),设华东、华中、华南各年议会。不久组成“中国中央议会”。到1949年,该会有牧区452个,牧师487人,传道214人,女传道239人,信徒102693人。(黄光域:《近代来华新教差会综录》,《近代史资料》总八十二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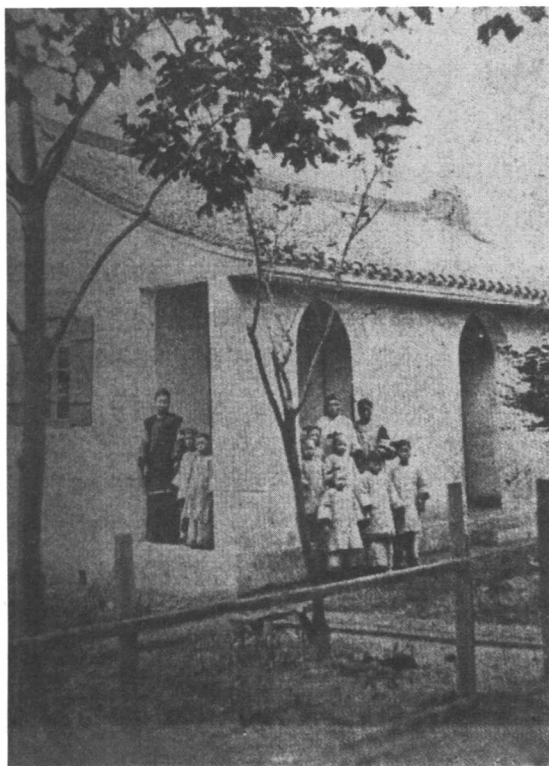
⑥ 从广义上讲,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三大教派。在这个意义上说,早在唐贞观年间,基督教就已传入中国。从狭义上讲,基督教又特指新教(又称耶稣教),本书在狭义上使用基督教一词。

⑦ A. W. Wilson,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p. 82. Nashville, Tenn. 1884.

⑧ W. R. Lambuth, The History, Policy, and Outlook of the Foreign Missionary Works of the M. E. Church, South, Missionary Issu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ashville, Tenn.



蓝柏(J. W. Lambuth)夫妇所乘爱利儿号帆船



蓝柏夫妇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义学

了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根据这两个条约中的相应条款，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内地各处传教，内地中国人可以信教传教。1868年，以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 Anson)为首的中国使团在访美时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亦称《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照指准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⑨美国人由此取得了在中国开办学校的条约权利。

由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影响，一直到1875年，监理会才继续向中国派遣传教士。此后不久，到上海、苏州一带的传教士就有潘慎文(Parker, Alvibn Pierson)、蓝华德(Lambuth, Walter R.)、孙乐文(Anderson, David Laurence)、柏乐文(Park, William Hector)、文乃史(文蕴彬, Nance, Walter Buckner)、海淑德(Haygood, Laura Askew)等。此外，慕文(Marvin, E. M.)和惠会督(威尔逊, Wilson, Alpheus. W.)等先后以会督身份代表监理会总部来视察在中、日等国的传教情况。

^⑨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63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这一时期监理会的传教事业非常顺利，1882年，已拥有三个教区十一个牧区。1886年11月间，惠会督出席了在上海昆山路林乐知住宅举行的第一届年议会。在年议会上，惠会督阐述了“母会对中国传教区的浓厚兴趣，及这片工场对传教事业的重要意义”。^⑩实际上，上海和苏南的传教事业构成了监理会在华传教事业的主体，监理会的传教事业并由此向日本和朝鲜扩展。

2. 监理会在苏州开教

基督教各宗派在苏州城区的开教始于1859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的活动；在苏州城乡的开教则发端于1858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韦廉臣（Williams, Channing Moors）、李瑾（Liggins, J.）和华人会吏黄光彩的活动。由于1860年6月至1863年12月太平军占领苏州，基督教在苏州开教后未能进入传播和发展阶段。基督教各派在苏州真正立足和开展正常的教务活动，严格说来，是从1870年监理会的传教活动开始的。^⑪

监理会在上海开教后，陆续发展了一批教徒。蓝柏渴望向苏州扩展教务，他劝使李

姓与殷姓两家到苏州居住。李家在苏州钟楼（即文星阁）附近落户，制作和出售纽扣，人称“纽扣李”。“纽扣李”的长子李伯莲是苏州第一个接受监理会洗礼的小孩。蓝柏到苏州时就住在李家。^⑫殷家本为苏州人氏，1853年在上海入教。1870年，蓝柏携同曹子实至苏州，租借殷家在葑门十全街的房屋，设立布道所和学校，由此开创了监理会在苏州的传教事业。

踵接而至的是美国南长老会、美国北长老会、美国南浸会，这四个教派是基督教在苏州的主要教派，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十九世纪末，基督教在苏州也仅此四个教派。它们的主要教务活动是建立布道所和教堂、创办诊疗所、医院和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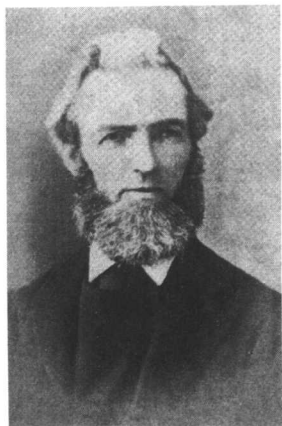
至1879年，监理会已在苏州陆续设立了四处布道所。一所在十全街石皮弄；一所在护龙街；一所在凤凰街；另一所在濂溪坊，均在天赐庄附近。由于教务的进展，1881年，经潘慎文、蓝华德等人努力，监理会在“天赐庄之折桂桥弄口谋得地基，建成设有四百人座位的耶稣堂”。^⑬1890年，监理会传教士韩明德及项烈也来到苏州。翌年，他们俩与华人牧师陈楹卿创立了宫巷乐群社会堂。1892年，监理会又在养育巷建立了救世堂。

^⑩ Minutes of the China Mission of Annual Conference of M. E. Church, South, 18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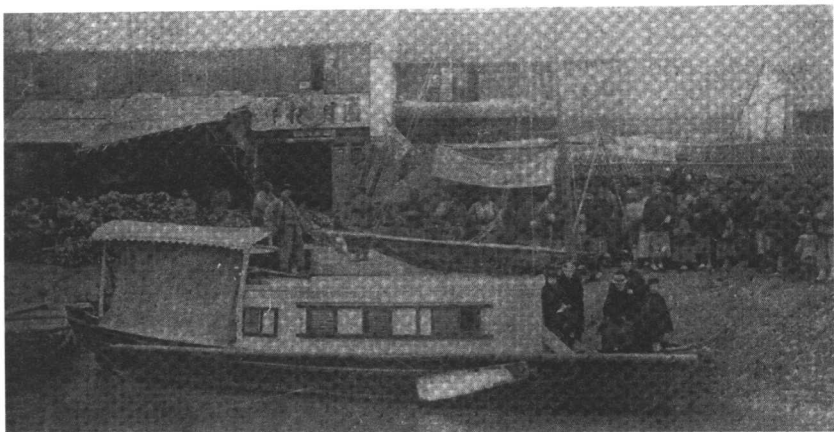
^⑪ 参见王国平著：《基督教在苏州的开教与初传》。《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⑫ 据A. W. Wilson,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Nashville, Tenn: Southern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884. 刘于1851年请求而于1852年1月与其妻一起受洗。

^⑬ 杨镜秋：《卫理公会传教士占据天赐庄八十年史话》（未刊稿）。



蓝柏



蓝柏到太湖一带布道时在船上及岸上围观的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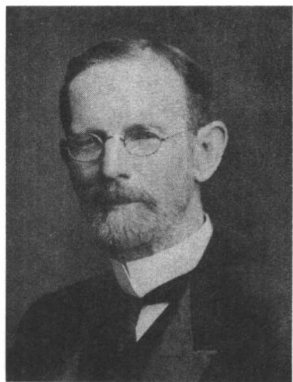
最先在苏州创建诊疗所和医院的是美国监理会。1877年，蓝华德在天赐庄租赁了三间民房办诊所，命名“中西医院”。1880年，蓝华德回美国研究医学和医院建筑。两年后，蓝华德携其妹夫柏乐文同返苏州，着手筹建医院。1883年初，柏乐文获得教会和苏州地方人士捐款一万美金，即以一千美金在天赐庄购得民田七亩，破土建院。半年后，一座庄园式建筑竣工，题名“苏州博习医院”（英文名Soochow Hospital），1883年11月8日正式开张。

博习医院是监理会的得意之作，《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称：当时，外国各教会“在华设立之施诊所颇多，正式医院则仅设于沿海四埠耳。自上海至北京二千里之内地，迄无一正式医院”，博习医院之创设，“实为嚆矢”。医院创办时，院务由柏

乐文、蓝华德主持。1884年，柏乐文回美国继续医科学业，1885年，蓝华德又随其父蓝柏去日本传教，院务改由曹子实主持。1886年，柏乐文完成学业返回苏州，担任博习医院第一任院长。

除博习医院外，1887年，监理会的斐医生（Phillips, Mildred M.）在博习医院以东建立了妇孺医院。该院在医务和医护教育方面均与博习医院协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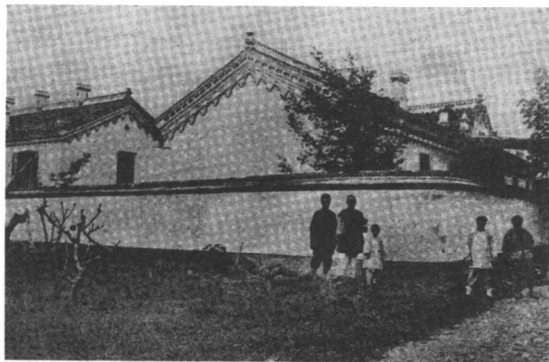
最早在苏州办学的仍是美国监理会。从1871年1900年，监理会在苏州创办了不少学校。其中有1871年创办的十全街主日学校，后发展为存养书院，再改名为博习书院；有1889年由监理会女布道会金振声（Alkinson, Virginia M.）在申衙前（今景德路）创办的小学，后发展为长春学堂；还有1895年由孙乐文在宫巷创办的宫巷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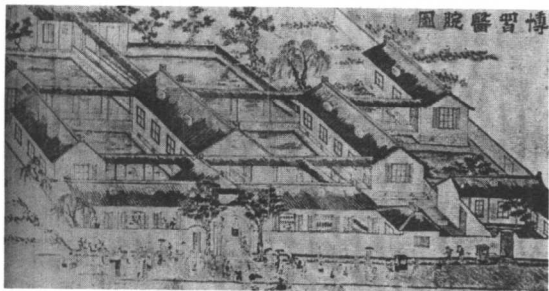
蓝华德 (W. R. Lambuth)



柏乐文 (W. H. Park)



博习医院



博习医院平面图

监理会在苏州的医疗和教育事业在苏州民众中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博习书院和宫巷书院的创办及其成功的教学活动，孕育着教会教育的生机，为东吴大学在苏州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3. 博习书院

博习书院是监理会最早在苏州创办的书院。它的前身是曹子实在苏州所办主日学校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存养书院。

曹子实是浙江秀水人，孤儿，十一岁时在上海得到传教士蓝柏一家的照顾。1859年，蓝柏夫人健康不佳回美国休假，带他同行。在美国，曹子实接受了一位会督的施洗，得到密西西比州马歇尔牧师 (Rev. C. K. Marshall) 的帮助，并取名马歇尔 (Charley Marshall)。蓝柏夫人回上海时，把曹子实留给雷大卫医生照顾。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雷大卫医生成为南部联邦军队的军医，曹子实是他忠实的伙伴和助手，并由此几乎学会了如同当时普通医生所懂得的一样多的“医术”。这番经历可能使曹子实成为惟一参加了美国南北战争的中国人。战后，在雷大卫医生母亲的帮助下，曹子实靠打工入美国学校读了四年书。1869年，在美国生活了十年的曹子实在一艘轮船上做工以抵船票，从纽约返回上海。

1871年，曹子实在苏州传教布道，并给